

眾裏尋他千百度： 佛教作為中歐文化紐帶的再發現及其歷史性意義

湛如
北京大學

摘 要：本文從語言學、文化學及宗教學的角度，探討佛教的印歐同源性及其歷史與現代影響。研究指出，佛教的語言、教義、宗教儀軌及哲學思想皆可追溯至印歐文明，與歐洲及南亞諸多文化存在共生關係。佛教不僅在語言和思想上與其他印歐宗教相互呼應，其輪回觀念、倫理道德與藝術形式亦展現出顯著的印歐特色。隨著佛教傳入中國，漢傳佛教經歷在地化轉化，形成兼具中國文化特色的修行方式、倫理觀念與政教互動模式，如禪宗簡約思想與家庭倫理的結合。文章進一步指出，佛教在中歐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橋梁作用，其普遍價值觀、慈悲理念與和平主義精神可促進中歐文明對話，增進雙方合作潛力，並在應對全球性議題如環境保護、社會公平及國際和平方面提供思想資源。由此，佛教作為文化紐帶，不僅承載歷史傳承，也具現實的國際交流與文明互動價值。

關鍵詞：印歐文明、佛教在地化、漢傳佛教、中歐交流、文化橋樑

引言

歐亞大陸，在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之中佔據有重要的地位，這是因為它首先是諸多古老文明的發祥地。可以說人類剛剛走出非洲，就在亞歐大陸上獲得了紮根的地域。像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古希臘文明與中華文明都起源於這片古大陸。此大陸由於其廣袤的地域與多樣的自然環境，也孕育了極為多樣的文明、語言、宗教、族群，從而形成了極為豐富多彩的人類文明景觀。在人類歷史的最近五千多年中，最為重要的文化交流與碰撞也主要發生在這片古大陸之上，綿延萬里的海上與陸上貿易通道，就成就了極為密集的商貿與文化交流網絡，從而將歐亞大陸上的文明都連接了起來。一直到近代大航海時代到來之前，歐亞大陸更是人類科技、宗教與文化的核心地域，這裡不僅誕生了無數極大地左右了人類命運的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更是幾乎世界上所有重要宗教的發源地或傳播中心。這些宗教與哲學思想對人類世界觀、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塑造，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即使是在近代全球化時代到來之際，歐亞大陸依然是全球地緣政治的中心。從古代的帝國擴張到一直到近現代的世界性戰爭，歐亞大陸始終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心。除了過去一百多年中的來自新大陸的美國，此前所有具有全球性影響力的國家都來自歐亞大陸。在歷史的蒼狗白雲般的變幻中，它們在這片土地上崛起、繁榮並且最終衰落乃至滅亡；可以說，在人類歷史的絕大多數時間中，歐亞大陸的文明史是人類歷史的核心舞臺。因此，在世界地緣格局中，重視歐亞大陸內部的力量整合，就是一個重要的戰略考量。

中歐之間，目前仍然存有相當密切經貿、文化與政治合作關

係，但日益加劇的中美爭衡為中歐雙邊關係注入了巨大的未知數。而佛教，作為一種來自印歐文化的宗教，與歐洲文化有著天然的聯繫。因此，以經歷了中國化過程長期洗禮的漢傳佛教為平臺，來加強與歐洲的文化互動與宗教交往，就不失為加強中歐聯繫、柔化中美關係、促進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徑。本文先簡要論證佛教的印歐文明要素，從學理的角度來探討佛教與歐洲諸宗教之間的共通之處。此外，本章還將討論佛教在東亞所經歷過的在地化改造過程。最後，再利用一些篇幅來討論中歐之間，佛教所可能起到的聯結作用。

一、佛教的印歐文明要素

印歐人 (Indo-Europeans) 是一个重要的人類學、語言學與社會學概念，它是指從南亞到歐洲的廣泛空間中所生活的民族，具有同源共祖關係。這個重要的推論最初是由歷史語言學領域中的從業者提出，偉大的英國語言學家威廉·瓊斯爵士 (William Jones, 1746-1794) 在 1786 年的一次演講之中提到：

梵語，無論其歷史如何，它都具有奇妙的結構。梵語比起希臘語更完美，比拉丁語更豐富，比兩者都更加精緻。因此，無論是在動詞詞根還是語法形式上，梵語都與希臘語與拉丁語有很強的親緣關係，此絕非偶然所致。它們之間的親緣關係是如此明顯，以至於任何語言學家在檢視三者之後，都無法再不相信它們來自某個共同來源，而這個來源也許已經不復存在了。¹

¹ Sir William Jones, *Discourses delivered before the Asiatic Society: and miscellaneous*

這裡所提到的印歐語的共同來源就是所謂的“原始印歐語”(Proto-Indo-European language, 簡稱 PIE), 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這種語言的存在, 但依然可以通過語法、詞彙等分析來獲得這一語言的重構。據當代學者的研究, 這一語言的使用時間可能是在公元前 4500 年到公元前 2500 年, 地點可能是在東歐的草原地帶 (the Pontic-Caspian Steppe)。² 在此後, 由於古印歐民族向四方播遷, 這種語言也隨後被帶到了歐亞各地, 從而形成了像日耳曼語族 (英、德語等)、意大利語族 (拉丁、意大利、法語、西班牙、葡萄牙語等)、凱爾特語族 (愛爾蘭、威爾士語等)、波羅的 - 斯拉夫語族 (立陶宛、俄語、捷克、波蘭語等)、印度 - 伊朗語族 (梵語、阿維斯塔、印地、孟加拉、波斯語等)、希臘語族、吐火羅語族等。也就是說通過語言學的分類研究, 可以將從南亞、西亞、中亞的整個印歐大陸板塊聯繫起來。甚至連中國新疆境內, 也存留有古老印歐民族遷徙與生活的痕跡。³

這些地方的民族, 不僅有語言上的親緣關係, 在宗教、社會與其他方面也都有著同源聯繫。比如在宗教與神話的體系與神靈角色之上, 雖然在印歐廣大領域中, 具體的信仰與神話故事各有

papers, on the religion, poetry, literature, etc., of the nations of India, 28 (Calcutta: Charles S. Arnold, 1824): “The Sanscrit language, whatever be its antiquity, is of a wonderful structure; more perfect than the Greek, more copious than the Latin, and more exquisitely refined than either, yet bearing to both of them a stronger affinity, both in the roots of verbs and the forms of grammar, than could possibly have been produced by accident; so strong indeed, that no philologist could examine them all three, without believing them to have sprung from some common source, which, perhaps, no longer exists.”

² Benjamin W. Fortson, *Indo-Europ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2nd ed.), 16 (Malden, Mass: Blackwell, 2010).

³ Victor Mair, “Prehistoric Caucasoid Corpses of the Tarim Basin,” *The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23.3 & 4 (1995): 281-307; J. P. Mallory & Victor Mair, *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0. 中文研究可參林梅村《開拓絲綢之路的先驅——吐火羅人》,《文物》1989 年第 1 期, 第 72-74 頁;劉欣如《從雅利安人到歐亞游牧民族: 探索印歐語系的起源》,《歷史研究》2011 年第 6 期, 第 156-167 頁。

細節上的巨大差異，但仍然可以從中抽繹出若干重要的共性。比如在神靈譜系之中，就會有很多類似之處，如很多印歐神話之中都有主宰天空的最高神靈，像希臘神話中的宙斯 (Zeus)、羅馬神話中的朱庇特 (Jupiter)、與北歐神話中的奧丁 (Odin)。再如風暴、閃電相關的神靈，如希臘的赫拉克勒斯 (Heracles)、印度的因陀羅 (Indra) 與北歐的索爾 (Thor) 等。

在此試以一個戰車 (Chariot) 的例子來稍加表述。印歐文明之中，有很多與戰車相關的神話故事。這不僅是因為戰車是古印歐民族的重要發明，也因為它在其社會之中佔據了重要地位。戰車的發明是以車輪發明為前提的，後者的發明時間不詳，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公元前四千至三千年時，就已經在整個歐洲與近東迅速傳播開來了，這也是人類最為重大的發明之一。⁴ 戰車目前最早發現於中歐大草原，時間為公元前兩千年左右。在此後就隨著原始印歐人的大遷徙，迅速向歐亞大陸的各地流傳。⁵ 馬拉戰車，對於沒有這項发明的其他民族來講，就形成了碾壓性的巨大軍事優勢，因此隨著印歐人的東征西討，它也開始嵌入了印歐的宗教與文化之中，成為了重要的主題。戰車也就成為了戰爭技術與崇高神性象徵的密切結合體，也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中物質與精神及信仰之間的緊密關係。在原始印歐神話中，戰車與駕駛戰車的神靈，像印度的因陀羅或希臘的阿波羅，就成為了人類頂禮膜拜的對象。天空之神或者太陽之神駕駛戰車，就是強調其在宇宙秩序之中的重要意義。與此同時，戰車或車乘，在古代社會中，也成為了是高貴階層與統治者的標誌。在神話與宗教之

⁴ Hans J. J. G. Holm, *The Earliest Wheel Finds, Their Archaeology and Indo-European Terminology in Time and Space, and Early Migrations around the Caucasus*, Budapest: Archaeolingua, 2019.

⁵ Elena Efimovna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321-322 (Leiden: Brill, 2007).

中，戰車的出現就往往代表了某種社會地位或崇高身份。在生死交替之際，也會藉助戰車的出現，來體現其中轉換的意義。因此，古印歐人，就會將死者葬在其戰車旁，或者將之一起火葬，以此來表達車乘的象徵意義。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我們就可以理解原始佛教之中車乘的意義了。像著名的“四門出遊”的故事之中，養尊處優的悉達多王子，就是在四次出遊中，分別看到了老、病、死與修行人之相。因此領悟到了人生的無常與修行的殊勝，從而放棄王位，出家為僧。在這個故事中，悉達多王子就是乘坐馬車外出。在《法華經》中有著名的“三車之喻”，即以三種車輛來比喻某種教義或法門，這同樣也應該在這樣一種亞歐文化的大背景之中加以理解。佛教正是孕育於印歐文明的環境中；自其誕生之初，就與印歐文明緊密相連。從佛教產生時期的歷史與哲學思想背景、傳統及文化習俗中，可以看到許多印歐文明的重要特徵。

據現代人類學與遺傳學研究，現代人類首次在 73,000 至 55,000 年前從非洲抵達印度次大陸，但目前此地所知的最早的人類遺骸祇能追溯到 3 萬年前。至公元前 7000 年左右南亞人開始向農耕與畜牧業的轉變，並在公元前 4500 年一致完成定居。到了公元前 25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現在印度西北部與巴基斯坦地區已經有了相當複雜的城市文明與文字。⁶

到了公元前二千年初，印度 - 雅利安 (Indo-Aryan) 部落在不斷的南下過程中，最終達到了印度次大陸的旁遮普 (Punjab) 地區。隨後的公元前 1500 到前 500 年就是印度的吠陀時期 (Vedic Period)，此時的印度開始形成了持續數千年的瓦爾納 / 種姓制度 (Varṇa /

⁶ Rita P. Wright, *The Ancient Indus: Urbanism, Economy, and Society*, 115-12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caste system)，也就是將民眾分為婆羅門 (brāhmaṇa)、刹帝利 (kṣatra)、吠舍 (vaiśya)、首陀羅 (śūdra) 與賤民等等級森嚴的階層。此時本來在中亞地區養成游牧習慣的印度雅利安人就開始從旁遮普地區慢慢向恒河平原發展。此時就社會政治而言，也出現了諸多小邦國 (janapadas) 受到兼併，從而形成較大的邦國 (mahajanapadas) 的過程，佛教的產生正是在這樣的一種歷史背景中。

此時印度的摩揭陀 (Magadha) 地區也是這些較大的邦國中的一個，並且恰好位於印度恒河平原東部的比哈爾邦的南部，也是當時印度城市化的核心地帶。摩揭陀在此後經歷了哈里揚卡王朝 (Haryanka, 公元前 544-前 413, 也即佛陀的時代)、謝舒納加王朝 (Śaiśunāga, 公元前 413-前 345)、難陀王朝 (Nanda, 公元前 345-前 322)、孔雀帝國 (Maurya, 公元前 322-前 184 年)、巽伽王朝 (Śunga, 公元前 184-前 73) 的統治。尤其是在孔雀王朝時期完成了對於印度次大陸的第一次大統一。摩揭陀在佛陀的時代伴隨著反對婆羅門思潮的運動，佛教與耆那教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中獲得了崛起。這些宗教的特點都是相對民主與包容，不會像婆羅門教那樣與階層政治的排他性緊密相聯，也不強調通常由婆羅門貴族來主持的儀式的特殊地位。

佛教以及當時其他宗教與哲學思潮的興起，也與這恒河平原地區的城市化、商業化興起有關。這一區域本來就是南亞已知最早種植水稻的地區，但此時城市化與商業化的發展，尤其是新興商人階層的崛起，也在宗教與哲學領域獲得了反映，耆那教與佛教的誕生也與這個社會背景有關。

因此，就總體而言，公元前的印度次大陸，印歐古移民與當地原住民相互融合，從而形成了極為獨特的文化與宗教大環境。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所提出的宗教哲學思想與教義教理就是在印歐文明的大背景下發展出來的。佛教在佛陀時代的傳播與發展

也同樣需要在這個背景之中獲得理解，在佛陀駐世的公元前六至五世紀，恒河地區的城市經濟與商業發展，已然使得商人階級變得越來越重要。這個具有龐大財力與物力資源，卻同時在舊有宗教體系之中沒有獲得相應社會地位的階級，就很容易地被佛教教義所吸引，而這與當時佔據主流的婆羅門教習俗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與此同時，商業與商人階層又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因此佛教在印度次大陸的商人社區中盛行之後，很快又通過商業活動與貿易路線很快傳播到了整個印度次大陸的各個角落，並且隨著商業活動的進一步推展，而向周邊地區，尤其是中亞與東亞流傳開來。佛教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性的宗教，也是與這樣一種大的印歐社會歷史背景有關。⁷

前言已及，在語言與文獻之上，佛教誕生之時有明顯的印歐文化特徵。不但最早的佛教經典是由印雅語 (Indo-Aryan languages) 的俗語 (Prakrit) 所傳播，在此後所廣泛使用的犍陀羅語 (Gāndhārī)、梵語 (Sanskrit)、巴利語 (Pali) 等，甚至包括此後在中亞地區所流行的和田語 (Khotanese)、吐火羅語 (Tocharian languages, 即龜茲 / 焉耆語) 等，也同樣屬於印雅語的範圍之內。因此，在佛教文獻之中，由於其內容是由印歐語言所拼寫，其中就可以看到大量印歐文明特有的思維方式與表達習慣。這種由語言所起到的決定性的作用，是宗教研究中很容易被低估的。

在哲學思想與教義教理領域，佛教與當時印歐的古代宗教都有很多共通之處，或者說是存在有一個更大的理解宇宙與世界的框架與儀式背景。特別明顯的像佛教中有生命輪回 (saṃsāra) 的概念。簡單來講，就是在業力的驅使下，在死後會發生生命的流轉，

⁷ Jerry Bentley, *Old World Encounters: Cross-Cultural Contacts and Exchanges in Pre-Modern Times*, 4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從而週期性地出現重生的現象，而宗教的修行則是要從這樣一種漫無目的的循環之中解脫出來（即 mokṣa、vimokṣa, vimukti、mukti 等）。這種不斷重生的思想，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就已經在從印度到希臘的廣大土地上為古印歐人所信奉。像耆那教中，與佛教一樣，業力與輪回也是其教義信仰的核心。婆羅門 / 印度教也同樣認為身體會死亡，但阿特曼 (Ātman) 則不會，它是永恆且堅不可摧的存在。古希臘宗教，也同樣認為靈魂經歷死亡後進入冥界，再經歷試煉與淨化後獲得重生。⁸ 這些思想雖然與佛教有若干不同，但還是可以看到其中的總體理解框架具有一致性。尤其是與佛教傳入後的中國人對死亡的理解相比，就有很大的差異。這種類似的情況也同樣存在於佛教對於宇宙與生命的理解之上，以及佛教的神話傳說體系及象徵系統，都與諸多印歐宗教存有深層次的聯繫。佛教通過禪定與冥想進行修行的方式，也是印歐不少宗教傳統中共有的實踐形式，像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在歷史上，都有在山區洞窟之中禪定冥想修行的習慣。在印度宗教中，這種修行就更為常見了。佛教也與印歐各類宗教中存有類似的宗教儀式與修行儀軌，像祈福、法會、獻祭、懺悔等，就都並非是佛教所特有，而是各類印歐宗教的共同特徵。在宗教倫理道德觀方面，佛教的五戒、十善等，都可以在印歐古代宗教的倫理觀念中找到類似的教誨，它們都強調人類應該節制自己的慾望，遵循若干道德法則，以達到與神靈或更高存在形態的和諧狀態。除此之外，即使是在佛教藝術與建築形式，在政教關係的總體原則等諸多方面，印度與中亞佛教也往往體現了非常濃厚的印歐色彩，而與東亞佛教形式有著不小的區別。

⁸ Norman C. McClelland, *Encyclopaedia of Reincarnation and Karma*, 102-103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2010).

佛教，總之作為一種在印歐文明背景下誕生的宗教，自然在諸多層面都體現出很多印歐文明的特點。無論是從語言、哲學、藝術到社會政治，印歐文明都為佛教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土壤。這種融合和交流，使得佛教在其起源時期就具有了廣泛的國際性，也為它後來的傳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佛教與歐洲哲學思想的關聯

前節主要從語言學的角度來揭示佛教與歐洲文明的血緣關係。本節遵循同樣的思路，將繼續探討佛教與歐洲近現代哲學思想方面的內在聯繫。如果從時間先後的角度來看，則佛教對於歐洲哲學思潮的影響大體是這樣的。上節提到，明清以降，歐洲的傳教士曾將歐洲的宗教與科技帶到了中國。大約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啟蒙運動 (Age of Enlightenment, 17-19 世紀)，歐洲人開始追求科學與理性的精神，不少思想家與哲學家也隨著新大陸的陸續開闢，將眼光投射到歐洲之外的全球各地。此時，其中有些思想家就對亞洲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雖然這一時期的不少人對於佛教的理解未必全然透徹，但卻為此後西方對於東方宗教哲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到了 19 世紀初之後，歐洲的宗教學者開始深入地研究亞洲的宗教與哲學，其中就包括印度與中國的佛教傳統。這些歐洲的學者在早期往往是從文獻研究入手，不僅翻譯了許多重要的經典文獻，研究了佛教的各種語言與文字，還在歐洲介紹了佛教的各類教義思想。

此一時期，較為重要的例子就包括德國著名哲學家、唯意志論者亞瑟·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雖然湯用彤先生曾經指出：

嚴格地說，叔本華既不信奉吠陀學說，也非佛教徒。他的哲學確實披著東方學究式的外衣。但是，叔本華哲學無非就是德國浪漫主義時代的合乎邏輯的產物。他的自然主義方法也無非就是 18 世紀經驗主義的遺產。他的神秘憧憬和美妙嚮往至多表達了歐洲中世紀的情感。至於東方智慧的精髓，叔本華終未登堂入室。⁹

但他強調苦難的無所不在，並且認為人類生活本身就意味著無始無終的痛苦，這種濃厚的悲劇主義思想，就與佛教之中的根本一諦——苦諦存有極為明顯的關聯。佛教以輪回世間為苦，而這也正是佛教修行，以求達至斬斷世間繫縛，獲得涅槃的動力所在。佛教認為人生的苦難，是來自塵世之中眾生的慾望。而叔本華思想特別強調獨立於時間與空間“意志”，並將之當成是帶來人生苦難的重要原因。擺脫這些苦難，追根溯源就要擺脫慾望，而這也有很深的佛教思想的烙印。佛教以持戒、禪定與般若智慧為途徑的修行實踐，以求擺脫人生的苦難。而叔本華，則提倡以審美、冥想等達到人與世界之間的和諧統一，這也同樣與佛教中的實踐有類似的軌跡。叔本華可以說是 19 世紀歐洲受到東方哲學影響的哲學家之一，它的思想就不僅帶有以佛教為代表的東方思想的印跡，更以此後的其他思想家提供了榜樣。¹⁰

受叔本華影響特別重大的思想家，就包括另一位德國著名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他對生命苦難的看法也同樣與佛教有某種關聯。其實除了

⁹ 湯用彤《叔本華思想中的東方因素》，《中國文化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31-35 頁。

¹⁰ 關於叔本華與佛教，可參 Urs App, *Schopenhauer's Compass: An Introduction to Schopenhauer's Philosophy and its Origins*, Switzerland: University Media, 2014.

尼采之外，歐洲的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就總體而言與佛教思想之間也同樣具有深層次的聯繫，因此尼采對佛教思想的個人愛好其實就代表了一個相當普遍的文化現象，並且也代表了歐洲知識精英對於佛教這種印歐文化母體中孕育出來的宗教，存有一種親緣上的好感。

尼采的哲學也同樣繼承了叔本華哲學中的悲劇人生觀，尼采對於生命意志的領悟，就是從叔本華思想中找尋到了靈感。尼采在其著作中曾多次提及對佛教的看法，甚至直接提到佛教是“唯一實證的宗教”(Der Buddhismus ist die einzige eigentlich positivistische Religion)。¹¹ 雖然尼采哲學與佛教，明顯屬於完全不同的文化體系，但尼采的悲劇主義精神，它對於永恆輪回思想的討論，以及在某些場合所展現出來的虛無主義特點，都與佛教之中的不少思想有著微妙的聯繫。¹² 與叔本華一樣，尼采也強調生命中的苦難，並且特別看重生命意志的力量，再加上他同樣批判了西方哲學體系之中的主-客體對立的思維，就都具有相當明顯的佛教思想的特徵。

到了20世紀，佛教對於整個西方哲學思想界的影響，最為常見的，還是存在於應用哲學與應用心理學的層面。尤其是歐美的心理治療領域，開始對佛教的禪修實踐產生了廣泛興趣。禪定開始越來越被認為是一種能夠幫助人們減緩都市人口的生存焦慮、工作壓力以及其他諸多社會心理問題的良方。科學家也開始用各種最新的儀器與手段，來全面地評估禪定、內觀、正念、冥想等

¹¹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 Gesammelte Werke*, XXIX (Berlin: Null Papier Verlag, 2020). 關於尼采與佛教的關係，學界研究已多，可參 Freny Mistry, *Nietzsche and Buddhism: Prolegomenon to a Comparative Stud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1; Robert G. Morrison, *Nietzsche and Buddhism: A Study in Nihilism and Ironic Affinities*, London: Oxford, 1997.

¹² 智化《尼采對輪回的領悟》，《法音》1992年第2期，第41-45頁；裴幸子《揭開摩耶的面紗——尼采哲學與佛教思想內在聯繫微探》，《牡丹江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第10-13頁。

一系列佛教的實踐修行形式，它們也被整合到各類心理治療的方案之中。

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 則是現當代西方極為重要的思潮，也可以說是最近不到一百年中相當引入注目的哲學現象。它本身是對現代主義 (Modernism) 的撥亂反正，是對工業化與都市文明過快推進的反思。後現代主義拒絕人類既有的“宏大敘事” (grand narratives) 與傳統權威設定，也否認絕對、普遍的真理；它對於傳統語言的能力也進行了無情的解構。這個極其複雜、多維度的運動，就反映了 20 世紀後期社會與文化的極速發展，也對人類傳統的價值觀作了深入的反思與批判。後現代主義的哲學家，其對於本體論的消解，對於主體的摒棄 (佛教的無我觀)，對於語言的解構等 (佛教中同樣強調工具的侷限性)，對於現實的解構 (佛教的分析論也是對現實的解構) 等，就都與佛教有著相當密切的思想聯繫，或者至少可以說二者在某些領域上起到了殊途同歸的效果。比如當代德國著名哲學大師馬丁·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的思想，也同樣明顯受到了佛教的強烈啓發。¹³

歐洲自啓蒙運動與工業革命開始，強調民主、科學與人本主義，這直接推動了整個世界走入了現代化，並且也使人類命運獲得翻天覆地的進步。但隨著上世紀二戰後的重建，人類思想也進入到了後現代時期與後物質主義時代。尤其是在歐洲，隨著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解決了基本溫飽問題之後，這些社會中人們的主

¹³ 對於海德格爾與佛教，可參王恒《論海德格爾的“無”》，《浙江學刊》1999 年第 2 期，第 91-96 頁；倪梁康《海德格爾思想的佛學因緣》，《求是學刊》2004 年第 6 期，第 20-32 頁；麥考·齊默爾曼著，孫冠臣、于豔玲譯《海德格爾、佛教與深層生態學》，《宗教與哲學》2014 年第 1 期，第 84-109 頁；李章印《理解人生：從海德格爾到佛教》，《文史哲》2019 年第 5 期，第 138-149 頁。

要關注點也隨之轉移到了男女平權、環境保護、動物福利、少數族群福利等方面，這其中，環境保護主義與生態哲學也日漸成為了哲學思想研究的重要領域。比如，由於防止虐待動物與環保本身的訴求，蘇格蘭於 1847 年就出現了世界上第一個“素食協會”，此後善待動物、敬畏生命的現代倫理觀日漸深入人心。隨著生態哲學與環境倫理學的大力發展，歐洲的生態哲學家也發現，並且從佛教思想之中汲取精神資源，以尋求自然與人類的和諧共生。在此過程之中，佛教對於自然環境的保護，佛教徒簡樸少慾生活對於現代消費社會的反制等，都是當代環境倫理學與佛教溝通的聯結點。因此可以說，當代歐洲的生態哲學家與佛教之間存有潛在的緊密聯繫。在面對全球生態危機的背景下，佛教的思想就可以為生態哲學提供重要的資源與靈感來源。

佛教是一種印歐文化所孕育的宗教，因此，從文化與思想基因深處，就鑲嵌著與歐洲文明相互交流並且互相促進的種子。隨著大航海時代以後全球化的到來，歐洲對於東方文明的好奇心與東方學的興趣也與日俱增。在這樣的背景之中，佛教開始傳入歐洲，並且對於歐洲近現代哲學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即使是在現當代，佛教依然對於歐洲的哲學發展有著巨大的潛在影響。而隨著今後雙方交流的加深，這種互動與影響也將更加明顯，並且達到互利互鑒的良好態勢。

三、佛教的亞洲文明改造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後，經過長時間的融合和發展，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這種中國化的過程，直接從公元後一世紀佛教進入中原腹地開始，一直到北宋末年大致初步成型，大約花了整整一個千年的時間。可以說，從印歐文明到東亞文明

的轉變過程中，佛教在各個方面都經歷了深刻的改造與適應。

這一過程首先在語言方面，佛教的語言政策非常明確，即主要運用各種當地語言來加以傳教。職是之故，佛教每次傳播到一個地域之後，就總是先會翻譯成當地的語言，在傳播到漢字文化圈中也是如此。佛教在傳入中國內地之際，其語言主要是犍陀羅語等俗語與佛教混合梵語；在此後的一段時間內，標準的梵語佛教經典也流行了起來。這些語言的佛教經典，在傳入中國時，需要將其翻譯成中文。這些最初的譯經者，多為來自中亞也印度的商人信徒與遊方僧。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僧侶與在家信徒，也逐漸加入到了譯經的團隊之中。隨著政府的直接贊助，中國的譯經活動又演變成了集體譯經的譯場形式。在南北朝與隋唐之際，這種集譯經、註釋與講經一體的形式得以定型，也有了極為嚴密的組織結構，從而能夠從制度上保障漢譯經典的質量。在此過程中，也有若干中國的僧俗，開始用中文編撰經典。這些經典，一方面以疑偽經的形式被編入了歷代的大藏經之中，或者以單本經的形式流傳，從而真正體現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意識形態。

在佛教的教義教理方面，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儘管佛教的核心教義如“四聖諦”與“八正道”依然得到了保留，但對具體思想的詮釋與抉擇，卻在與儒家及道家思想的互動中，展現了中國佛教徒自身的特點。像印度佛教強調與原初家庭之間關係的割裂，由於中國傳統儒家思想重視家庭倫理的原因，因此漢傳佛教往往也會強調家庭倫理與佛教修行的結合。因此，就往往將孝順父母、忠誠於朝廷及及君主當成是其社會倫理的一部分。中華文化崇尚簡約，到了中國的禪宗，就特別強調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不依賴文字與經典。其他比如佛教與道教在某些中下層信仰方面的融合，以及淨土信仰的特別流行，也都體

現了非常鮮明的中國化特徵。即使是近代人間佛教的提出，雖然其背後有外來宗教衝擊的影響，但強調在塵世間即可成佛、獲證菩提，而不去追求他世的極樂世界與超脫塵俗，則也與中國人注重此世，相對輕視超越性的總體思想偏好有關。

在修行與儀軌方面，漢傳佛教也極具中國化特色。相對而言，印度的佛教修行方式更為重視林住禪修與離世苦行。而中國佛教，尤其是禪宗，除了繼承既有的禪修傳統之外，同時也強調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佛法，而不僅僅是在寺院或山林中，這就使得佛教的修行也更加世俗化、此世化。在日常儀式上，漢傳佛教也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例如漢傳佛教的很多節日，如各類菩薩的誕辰日紀念、焚燒香燭紙錢，以及其他特定的佛教節日，像臘八節等，也都是與中國的傳統節慶紀念活動結合了起來，從而得到了在民間的廣泛傳播與接受。

印度的佛教，是屬於印歐宗教的大框架之內，其政教關係體現出了印歐宗教的主要特徵，其中就包括教權的相對獨立，以及教權相對政權的重要地位。但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教權日益被納入到世俗政權的管理之下。佛教也就此失去了治外法權，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教互動模式。也即封建王朝與皇帝經常會贊助佛教，建造寺院，並以朝廷的名義來推動經典的翻譯，而教權則要服從於王權的管理，僧侶則為朝廷與皇帝祈福，以確保國家的穩定與繁榮。

因此可以發現，佛教在從印歐文明到東亞文明的轉變中，經歷了多方面的自自我改造與在地化適應。正是這些在地化與地方化努力，方纔使得佛教不僅在中國得到了深入的發展，而且也在此後兩千年的發展過程之中，對整個東亞地區的文化與社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與此同時，佛教的改造與適應也並非是一個完全被動的過程，此一過程中佛教與中華文化有著相互的作用。

一方面來自印歐文明的佛教受中華文化的影響，從而經歷了漫長且深刻的在地化；與此同時，它也對中華文明產生影響，最終形成了獨特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體系。漢傳佛教，雖然其根源來自異域，卻最終成為了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喜馬拉雅山與阿爾卑斯山之遇： 佛教文明對中歐的聯結

中華文明與印歐文明的交往，除了中歐腹地的古吐火羅人曾在史前進入到中國的中亞地帶以外，較早的歷史則可追溯到公元前 2 世紀的漢朝。此時由於張騫（卒於約公元前 114）開拓的絲綢之路，連接了東西方，一直延伸到了羅馬。這條從公元前 2 世紀直至十五世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崛起，一直極其活躍的歐亞貿易路線網路，它橫跨了 6,400 公里，從而直接推動了中歐間的經濟、貿易、文化、政治與宗教等各方面的交流與互動。這條道路上，來自西方的各類珠寶、玻璃、馬匹、駱駝、黃金、香料，被交換為來自東方的瓷器、茶葉、絲綢織物等，這不但為商人創造了驚人的貿易財富，也讓印度的制糖術、天文學、曆算學東傳，更讓東方的造紙術、火藥與印刷術西傳，這也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除了商品交換之外，中歐間的舊絲綢之路，更是促進了東西方思想、哲學與宗教的雙向傳播。佛教正是遵循這樣一條傳播路徑，從而傳到了東方，並且重塑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到了元代（1271-1368），隨著帝國疆土的空前擴張，歐亞之間的交通道路也前所未有地暢通，此時歐洲與中國的聯繫也更加頻繁。此時中歐間不但有大量的貿易活動，人員來往與宗教交往也極其頻密。馬可·波羅（Marco Polo，約 1254-1324）在《馬可·波

羅遊記》(*Il Milione* 或 *Book of the Marvels of the World*) 中，他非常詳細地將東方文明的山川地貌、風土人情與內部運轉都作了介紹，從而讓歐洲人得以較為全面地瞭解中國與其他很多東方國家與城市的大體情況。¹⁴ 而到了明清，來自歐洲的傳教士，不但來到中國傳播天主教，同時也將歐洲的最新科學、技術與文化知識帶到了東方，在他們回程之際，也將中國的文化、科學技術與哲學思想等帶回了歐洲。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近代，隨著鴉片戰爭的開始，中國與歐洲的交流又以一種遠非文明的方式打開了全新的一頁。此後不少歐洲的學者，也開始對於佛教有了更多的認知。近現代的歐洲哲學家，如尼采、海德格爾等，也都對佛教與東方文化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並受其啟發。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隨著冷戰逼近尾聲，中國與西方關係的緩和大背景之下，中歐間的關係也逐漸緩和加深。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中葉，中國與現歐盟的前身——歐洲共同體建立了外交關係之後，再加上為了對抗蘇東陣營的戰略考慮，中歐間的關係日漸密切。到了八十年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行，歐洲開始成為中國的重要經濟夥伴，雙邊的文化、學術與人文交流也日益增多。直至九十年代末，中國與歐盟宣佈建立全面的戰略夥伴關係，標誌著雙方關係的進一步深化。此後歐盟在長時間內成為了中國重要的貿易夥伴；此外，雙方還在全球治理、反恐、氣候變化等多個領域開展重要的合作。

在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佛教作為一種文化與宗教橋樑在中歐關係中的潛在價值就日益凸顯出來了。首先，佛教是起源於印歐大陸的宗教，在文化與宗教基因上帶有深刻的印歐精神烙印，

¹⁴ Marco Pol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London: J.M. Dent & Sons, 1927.

更容易在歐洲產生歷史與文化上的共鳴。另外，現代佛教，尤其是來自南亞斯里蘭卡等地的上座部佛教，早在兩個世紀之前就已經登陸歐洲，並且在歐陸與英倫有過相當廣泛的傳播歷史。這就為漢傳佛教在歐洲的傳播提供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前期鋪墊。

佛教最初誕生於印歐古陸的文化母體；因此有望將佛教中所體現出來的普遍價值來作為溝通聯結中歐文明的重要紐帶與橋樑。像佛教中所強調的慈悲、和平主義與中道觀等思想，就在很多歐洲文化中都有其對應的概念，而這也為中歐之間的對話提供了共通的價值基礎。與此同時，更可以加強中歐間的宗教實踐的交流。比如佛教強調冥想、禪修，而這些實踐在包括歐洲在內的大部分現代都市中也日益受到歡迎。因此通過佛教的交流與學習，雙方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彼此的宗教實踐與經驗。

中歐之間，目前在很多領域之中都存有合作的潛力，尤其是像環境保護、反對恐怖主義、全球慈善等。因此，可以以佛教為交流平臺，來推動中歐的宗教領袖之間的對話，以此來探討宗教在現代社會中，尤其是在醫療、教育、環保與慈善等領域中所擔當的角色，並研究如何促進不同文明、國家與群體間的互助合作與理解共存。另外，在學術、藝術與文化交流等諸多方面，佛教也同樣可以作為溝通中歐間交往的重要平臺，以加深雙方在上述各領域之中的互信、互利與合作。總之，佛教確實可能作為中歐間聯繫的紐帶，為此發揮諸多正面的作用，以加強雙方的溝通與理解。但這需要雙方的積極參與合作，也需要在思想深處不斷體認中歐間包括佛教在內的文化紐帶，以及深入瞭解佛教對彼此歷史文化的深刻影響。在相當程度上，中歐關係將左右未來的全球地緣政治走向。如何在這個邁向多極化，且充滿未知數的世界中，為世界和平事業作更大的推動，則重新認識佛教對中歐的紐帶作用將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結論

印歐同源是一個基於語言學的推論，並且獲得了人類學、社會學與宗教學的證明。像佛教的梵語，就與歐洲諸多重要語言都同屬於一個更為古老的“原始印歐語”的分支。這主要因為印歐人的祖先，曾生活在東歐的草原地帶。在此後的時間中，他們向歐洲與南亞、中亞與西亞遷徙，從而發展出印歐大陸的諸多民族。這些民族的語言、文化、藝術、神話、宗教等因此就同樣有同源共生關係。像佛教，就同樣有著諸多印歐宗教的共同印記。它的誕生與初期發展形態，需要在整個印歐文明的大背景中加以理解。這不僅包括佛教的語言多為印雅語，在教義思想與宗教實踐領域，也同樣與其他印歐宗教有相似之處。比如像佛教之中的輪回觀念，就是諸多印歐宗教之中的共同教義。其他如宗教儀軌、倫理道德、藝術與建築形式、政教關係互動等方面，佛教都體現了濃厚的印歐主義特色，而與東亞佛教形式有很大的區別。

在哲學思想層面，佛教與歐洲近現代哲學思想有著相當緊密的內在聯繫。自 19 世紀，歐洲的宗教學者開始研究佛教。包括亞瑟·叔本華與尼采。他們強調人生的苦難，獨立的意志等，都展示了佛教影響的痕跡。到了 20 世紀，在應用心理學的層面上，佛教得到了空前的重視。而後現代主義的哲學思想，也同樣明顯受到了佛教的強烈啓發。

人類最近數十年，進入到了後現代時期與後物質主義時代，尤其是在進入發達社會的歐洲。因此，男女平權、環境保護、動物福利、少數族群福利等問題就凸顯出來。在面對當代全球性問題之際，佛教也同樣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佛教傳入中國後，又經過了在地化的過程，形成了有中國特

色的漢傳佛教。這體現在語言方面，來自印度與中亞的語言被譯成了漢語。特別專業的譯經隊伍，更使得佛經翻譯的質量獲得了保證。佛教經典，還在翻譯的過程中，就得到了傳播。而對於佛教經典的撰寫，也體現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精神好尚。在教義方面，除了保持佛教的基本核心思想之外，對具體佛教思想，中國的信徒則作了相當具有特點的檢擇。像漢傳佛教就特別強調家庭倫理與佛教修行的結合，並將孝道、忠於國家等觀念與佛教倫理融合了起來。此外，禪宗的某些思想，也與中華文化崇尚簡約的特點存有聯繫。其他如佛道教，乃至三教的融合特點，淨土思想的流行，以及人間佛教思想等，都體現了中國化的明顯特徵。在修行儀軌方面，漢傳佛教也有濃厚的中國特色。相對於印度佛教更重視林住禪修，漢傳佛教則更強調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佛法。在政教關係上，印度佛教也更加獨立，而漢傳佛教則被納入到世俗政權的管理之下，日益成為了政治的附庸。

中歐之間的交往，源遠流長。早期的絲綢之路，就為中歐間經貿易、文化、政治與宗教等各方面的交流與互動提供了便利，佛教也是藉助這一孔道來到了東土。此後一直到近代，中歐間一直存在有相當密切的交流。冷戰之後，中歐間的關係，尤其是經貿、文化與政治交流更加密切。但近些年來，隨著東西方矛盾的加劇，中美間關係的惡化，中歐關係的前景也蒙上了陰影。因此，如何藉助最初誕生於印歐文化的佛教來作為了一個溝通中歐友好聯繫、弱化中美矛盾的平臺，就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不但可以將佛教所體現出來的普遍價值來作為溝通聯結中歐文明的重要紐帶與橋樑，還可以以佛教中所強調的慈悲、和平主義與中道觀等思想來為中歐之間的對話提供共同的價值基礎。中歐之間在諸多領域之中都存有合作的潛力，像環境保護、“反恐”、慈善、

學術交流、藝術文化交往等。基於亞歐大陸在世界地緣政治之中的核心地位，祇有重塑中歐間的良好關係，纔能為中外關係，以及世界和平事業提供一個重大且堅實的基礎。在這一關鍵的歷史進程中，作為中歐之間一個重要的文化紐帶，佛教應當也可以發揮其獨特的作用。